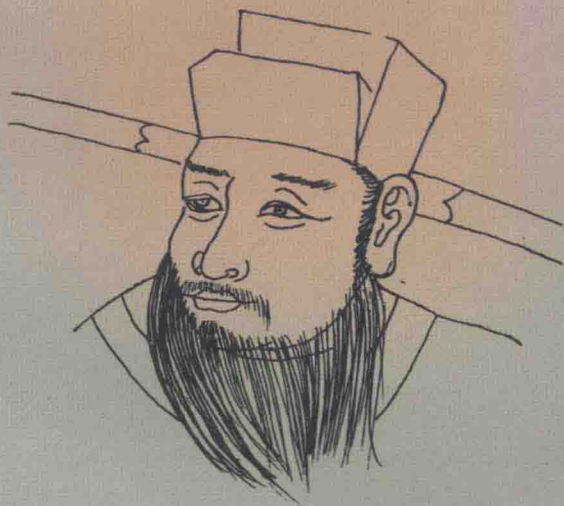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ZHONG GUO LI SHI
REN WU CONG SHU

★第十七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第十七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包拯

一、辞官养亲	(3)
二、出使契丹	(7)
三、财税大吏	(10)
四、三弹张尧佐	(15)
五、七弹王逵	(20)
六、上书言七事	(23)
七、任职河北	(29)
八、权知开封府	(31)
九、御史中丞	(37)
十、蹊田夺牛	(42)
十一、辞世	(47)

文天祥

一、豪言壮语出少年	(51)
二、从乡试第一到状元及第	(54)
三、刚直不阿	(58)
四、兴兵抗元	(60)
五、敌营斥贼	(66)
六、不指南方不肯休	(70)
七、再举义兵	(83)
八、留取丹心照汗青	(87)

海瑞

一、清苦童年 刻苦攻读	(100)
二、尊礼节法度的儒学教谕	(106)

三、替民分忧的知县	(110)
四、冒死上书 一心为国	(124)
五、安定一方的巡抚大员	(130)
六、东山再起 死而后已	(140)

李自成

一、在苦难的岁月里锻炼成长	(147)
二、杰出的革命闯将	(156)
三、养精蓄锐 不屈不挠	(165)
四、无敌的铁流	(172)
五、不朽的历史功勋	(183)

袁崇焕

一、机智的童年	(195)
二、辽东的失守	(202)
三、奉命监军关外	(207)
四、重返关外督师	(217)
五、恢复辽东 杀毛文龙	(222)
六、入援京师	(225)
七、袁崇焕之冤死	(229)

包拯

肖澍 编著

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半个多世纪的比较稳定和发展时期，到了第四个皇帝仁宗即位以后，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北方西夏不断侵扰，契丹虎视眈眈，民族矛盾尖锐；内部皇亲国戚日益受宠，文武大臣追名逐利，军队将领愚昧无能，地方官吏昏庸懦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范仲淹等革新派发起的改革时弊的“庆历新政”也如昙花一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敢于直言，坚持正义，令权臣贪官胆寒的人物，他就是在我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千古清官——包拯。

一、辞官养亲

包拯，字希仁，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父亲包令仪，字肃之，曾中进士，当过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的行政长官。母亲张氏。

包拯青少年时代，“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就是说，包拯在青少年时期，就很有个性，挺然独立，少年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不进行顽皮的嬉闹。早年曾经跟随父亲在外游学。所读书籍当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孔子、孟子的思想和言论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从包拯的性格及成人后的成就，我们可以知道，包拯学习是很勤奋的，对书中的道理确信不疑。他在中年后曾回顾说，他早年“尽信前书所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就是说：他对古人书中记载的事物和道理是信奉不移的，对古代圣贤们高尚的思想行为是非常羡慕的；他懂得如何侍奉君王和如何约束自己，保持有竭尽忠义和舍身取义的本分。自己一贯地保

持信念并付诸实践，以此来勉励自己，规范自己。所以，青少年时期的包拯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即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在包拯的一生中都矢志不移，充分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包拯参加贡试，中进士甲科，时年 29 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大理评事的职衔，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当知县。包拯考虑到建昌离家路途遥远，父母都已年迈，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而且包公的父母也不愿意离开合肥，为了让父母过一个安定欢快的晚年，包拯向朝廷请辞建昌县令一职。

考虑到包拯孝心可嘉，朝廷准许他不去建昌，而改派他当了和州(今安徽和县)的监税官。和州离庐州很近，包拯前去赴任。但他的父母还是不想离开合肥随迁和州，包拯只好再次辞官，回到家乡赡养两位老人。

几年后，包拯的父母相继去世了。包拯含泪埋葬了双亲，就在父母坟墓旁盖了小房守孝。包拯守满孝期(宋朝为三年)后，本可立即出来作官，但他仍然徘徊于父母坟墓之侧，恋恋不忍离开安葬父母的乡土。家乡父老为包拯的孝心所感动，纷纷劝说包拯。包拯在乡亲们的再三劝勉后，才下决心离开故乡，离开父母的坟墓，到京城等候差遣。

包拯两次辞官不就归养老人、竭尽孝道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人们广泛的称赞。自隋唐建科举制以后，通过科举求取功名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一中举得官立即赴任，有的甚至不顾父母年迈病笃，或者丢家舍妻弃子，如戏剧中的陈世美。包拯没有为了当官而忘了尽孝子之道。讲求忠孝，不恋高官显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这也是包拯后来不畏权贵，

坚持正义的思想基础。司马光的《谏水记闻》记载后来当过宰相的王珪的话说：“希仁始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门生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说：“包公一举甲科，拜八品京官，派往大邑作官。在当时，同中第者，即使下流庸人，犹数日月以盼望得个尊贵肥美的官位。而包公拂衣辞官赡养双亲，十年不出来作官，一心一意，以能够奉养老人尽其孝心为最快乐的事。”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包拯奉调到扬州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县)当知县。此时包拯已经40岁了。上任之初，他写了一首诗以自勉：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才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悲；史册有遗训，无貽来者羞。

包拯决心清心为官，直道而行，遵行古代圣贤的遗训，使自己成为国家栋梁之臣。

《宋史》记载了包拯在天长县处理的一件案子，有一个老百姓来告状，说他家里养的一头牛，忽然夜里被人割掉了舌头。包拯听了，告诉这个原告，回家之后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原告按吩咐去做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宰杀耕牛卖牛肉是有罪的。很快就有人来告发，说牛主私自宰牛。包公知道这人居心不良，当即一拍惊堂木，说：“你为何偷偷割掉了人家耕牛的舌头，要害死别人的牛，现在倒恶人先告状，诬蔑别人犯法！你是什么居心，还不从实招来！”此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老老实实供出了做恶经过。此案虽小，却已显露出了包拯断案的才能。

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高要)知州。一到任，就发现有许多遗留案件拖而不决。包拯认真审理卷

宗，深入基层，迅速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该判重刑的重判，罪小者从轻发落。包拯严肃认真干练的作风受到当地官吏、百姓的称颂。

端州以产砚石著名。我国文房四宝中，以端砚（广东高要端溪出品）、湖笔（浙江湖州出品）、宣纸（安徽宣城、泾县出品）和徽墨（安徽徽州出品）最享有盛名。端砚是朝廷所规定的贡品，每年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贡额。历任端州知州都利用向朝廷进贡为名，在规定数额之外，总是随意增额，比规定贡额多达数十倍，将端砚作为珍贵礼品，分赠给朝廷的高官显贵。百姓受尽缴砚制砚之苦。包拯到任后，只让砚工按朝廷规定数额交纳。

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卸任离开端州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

包拯的清廉爱民受到端州百姓的交口称赞。传说，当三年后包拯调离端州时，百姓们想送包拯一块端砚作纪念，但是包拯不接受。有一个人用黄布包了一块端砚，偷偷放到包拯所乘的船上。包拯辞别众百姓离开端州，船开到羚羊峡口（今广东肇庆附近），忽然狂风暴雨大作，船不能行。包拯见此情景，十分惊异。他扪（mén）心自问：“难道我做了对不起端州百姓的事吗？老天爷为何要为难我？”这时他发现了船舱中用黄布包着的端砚，一时恍然大悟，将砚抛至江中，此时风停雨住，霎时晴空万里，船又能开动了。后来，在包拯投砚处，从江中涨出了一座沙洲，据说就是由这块砚石长成的。人们就叫它“黑砚沙”。江心投砚这个传说，反映了包拯为官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包拯在盛产名砚的地方为官三年，一砚不取，这在古今中外为官者中都是罕见的。后来端州府城门上刻有一副对联：

“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zhǔ)清风播古今”。星岩指肇庆七星岩，包拯在庆历二年曾到此一游，并刻石题名；砚渚就是指墨砚沙。

二、出使契丹

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包拯进京担任了监察御史里行的职务。

宋沿袭唐制，设置御史台为监察机关，掌纠察官吏，肃正纲纪，主要责任是揭发弹劾违法犯纪的官吏，上奏皇帝给以处罚。大事廷辩，小事奏弹。御史台设御史中丞一人为长官。所属有三院，台院有侍御史一人，作为副属；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二个，以纠掌百官上朝时失仪者；察院设监察御史二人，以参弹文武百官的种种不法、不妥的行为。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中资历较低、职位较浅者，相当于副监察御史。

包拯由地方官进入中央机构，开始更加注意了解涉及国计民生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当时，地处西北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起兵反宋，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建夏国，不断发兵侵略北宋，宋夏交战，宋胜少败多。庆历二年正月，契丹主(辽国983至1066年间称契丹。)派遣两名使者至宋，乘北宋惨败于西夏之机来索要晋阳至瓦桥以南十县，并集大军屯扎于宋辽边境。四月，北宋派遣富弼出使契丹，拒绝了契丹的无理要求。至八月，宋与契丹达成协议，以宋增加岁币十万匹，银十万两而继续和好。宋辽在“澶渊之盟”后长达40年的均势被打破。

根据这种情况，包拯提出了《论契丹事宜》疏。指出自宋与

契丹澶渊之盟以来，边境安定无事。但近年因元昊背叛，契丹借机邀地。从契丹内部看，官吏俸给低，人民生活困苦，滋生了向南扩张的野心。但因受各种条件牵制，还不能无衅而动。那些认为“四夷乃支体之疾”的论点是错误的。“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不能单凭什么“盟誓”而产生麻痹思想。国家每年用给辽国银绢换取和平，非御敌之策。《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就是说，应立足加强战备，有备才能无患。包拯还指出，边防存在严重问题，沿边诸将多不是合适人选，他们不讲战略战术，不练兵，不修战备，放松懈怠，“郡无善将，营无胜兵”、“一旦急用，必先事而败”。此种状况令人“寒生毛骨”，因此建议“选求将帅，精练卒伍，广为积聚，以大警备之”。

庆历四年，包拯升任监察御史。西夏尽管在战场上连获胜利，但国力贫困，物力耗损严重，得不偿失，改用议和来谋求宋交纳银绢和物资。庆历四年九月，元昊派杨守素来进行谈判，包拯上《论昊贼事宜》疏和《论杨守素》疏。指出如何处理与西夏的关系，“系国家安危之机”，对于元昊的要求，应该等待情况变化，再作商量。并指出，西夏十分猖狂，有“无厌之求”，讲和许赐帛缯茶货未必能保住安全，所以仍应加强战备。建议各边防地带招募土民，积极训练。并提出武将是国家安危所系，要特别慎重选择。对于有才干之人，“擢而用之，专而委之，必有成功”。

宋太祖由于是由将领兵变当上皇帝，所以从建国之后就采取了许多限制武将的措施。这也是造成宋朝抵御外敌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拯在监察御史任上，提出了许多改革军队的建议。

庆历五年八月，包拯奉旨出使契丹，作庆贺正旦使。当时宋与契丹表面上是和平的，但实质上是紧张。契丹贵族经常寻衅滋事，作为外交使节，一方面要大义凛然，一方面要谨言慎行，注意维护祖国的利益与尊严。

包拯出使契丹，在举行庆贺正旦仪式之后，于庆历六年正月初四做回国的准备。当天夜里，包拯等举行夜筵。吃茶停当，契丹的生辰馆伴副使张宥(yòu)对包拯说：“请暂退左右，有事要说。”等左右人等退下之后，张宥说：“贵国雄州（今河北雄县）新开便门，想要接纳我国燕京（今北京西南）一带的奸细叛徒，以此来刺探我们的边防情况和朝廷内幕。请你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对于契丹官员的挑衅，包拯立即予以反驳。包拯说：“贵国涿州（今河北涿县，地处辽宋边境地区）也曾经增开城门，难道也是要接纳叛人奸细，刺探我大宋边防战备吗？如果要引诱奸细，刺探边防情况，为什么非要开一便门呢？”张宥等无言以对。包拯又说：“我国经常戒飭沿边各地，不能随意滋事。而贵国却屡有入我疆界，创城立寨之事发生。这些情况，恐怕你们的君主也未必清楚。希望我们两国之间，遵守盟约，各守疆界，不互相寻衅滋扰。”

包拯一席话，不卑不亢，转守为攻，说得契丹馆伴面露尴尬，连连称是。包拯挫败了对方的挑衅，维护了北宋的尊严和利益。

包拯出使契丹，更加深了对契丹奴隶主贵族的了解。返回朝廷之后，接连向仁宗递呈了两份奏疏，一份是论边将，一份是再论契丹。

包拯指出，边防重将一定要慎重选择，特别是代州（今山

西代县),与契丹接近,道路平坦,很难防卫,因此宜选派得力干将防守。现在的守将郭承祐(是仁宗叔父舒王元偁的女婿),很不得力,应立即撤换。选择边帅应不分文武,不限高卑,而应通过应敌制胜、安边御众等策略问题进行考察咨询,加以擢用。

对于契丹,包拯认为,近年来他们以讨伐西夏为名,真实意图很难预测。切不可依赖盟约,放松边备。

三、财税大吏

庆历六年(1046年)秋天,包拯以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转运使又称监司、漕司,是专管一路财政的官员,职权很大,也管边防、治安、司法、钱粮和按察工作,对于所辖府、州、军的地方官吏,也有监督弹劾之权。京东路包括今河南东部、山东大部 and 江苏西北一部分。任用包拯担任转运使,说明朝廷对他是信任和倚重的。

包拯上任后,注意深入基层,明察暗访,了解官情民情,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看到各州军诸色人等,长期亏欠官物、钱帛、斛斗,共约2万贯石,牵累人员众多。主要原因在于主管仓库物资方面,因年岁久远,某些物资逐渐消耗折损,或由于看管者本身死亡,或由于家产荡尽,牵连担保人员。尽管严加催纳,但都是贫穷人户,无济于事。包拯认为,州县催理这种亏欠,徒增骚扰,对国家没有什么小益,对老百姓则形成大害。他根据政府有关条文,希望仁宗放免各种欠负官物。

京东路一部分地区以出铁著名,但冶铁户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拯亲自巡历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

了解到一些冶铁户家境贫困，长期无力开冶，交纳不出铁货，只得将田产变卖、“抱空买铁纳官”。但官府依然强迫他们按定额交纳铁数。富民恐怕留下后患，不肯兴创，所以铁货数量日渐削减，长期不能振兴。包拯希望对确实破产的冶户，或无力开炉的冶户，详细进行调查，在规定时间内保明，申报转运司，销掉姓名。对州县故意放纵，或冶户妄图逃避，许别人检举揭发，给以处分，并给告发人赏钱。州县还应招集诸色人等开炉起冶，不得阻碍留难，达到铁货增产充溢，宽民利国。

庆历七年四月，包拯以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改任陕西转运使。陕西路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等部分，以及山西、河南一部分，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在陕西转运使任上，包拯发现同州韩城的铁冶务共有 700 余户。其中 200 余户财力雄厚。充当里正的都是高强人户。他们假借冶户之名，在 50 余年内，隐瞒州县的各种差役。第一等冶户，每户每年向铁冶务提供差使，所出钱数不过三贯。铁冶务把全县的上等力役全部包占，弄得下等人户差役频繁，来不及供差。但铁冶务全年所得铁货只不过十几万斤，又要支出买炭钱、工匠钱 300 余贯，还要派出专监使臣一员。这笔帐并不合算。包公建议，应将十几万斤冶铁任务，根据不同等别在本县人户身上分配，每户交纳官铁，每年不过十斤或二三十斤。应该允许百姓取便烹炼，铁价必然下跌。还令百姓赴本县送纳，一则比较方便，二则还可减省监官一员，又可把原来实力雄厚的上等户，充当重难衙役。这样，老百姓的负担可以比较公平合理。

包公还上《请出内库钱帛往逐路采粮草》疏。根据宋夏战争以来，关中一带出现民生凋弊、物货骤贵的现象，指出一切财用完全出自民间，当今之际，最重要的是安定，安定之道，仅

仅在于不进行横赋，不进行暴役。“伏望陛下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根据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财政不足的困难，且以宫殿的内帑钱借助，以加惠于百姓。如果民心安定，契丹、西夏是不足忧虑的。

转运使是一路之长，是掌握实权的美官肥缺。很多转运使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讨好皇帝，有的横征暴敛，贪赃不法，或者巧立名目，压榨百姓。包拯当转运使，以百姓之忧为忧，以百姓之苦为苦，考虑问题首先是从老百姓的现状出发，力求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和负担。他呼吁皇帝要安民，安天下，不横赋，不暴役，给百姓以生路，使北宋政权得以巩固。当然，包拯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赵宋皇室的政权，但他同情人民疾苦，勇于为民请命，在封建时代的官吏中是难得的。

庆历八年(1048年)，包拯调转为河北转运使，未及成行，又提升为三司户部副使，主要掌管天下的户籍、赋税等等。包拯向仁宗面奏时，提出：“为政的宽仁与苛暴，要看能否做到少赋敛，宽力役，救灾患，认真实行这三者，就会衣食增加充裕，百姓安居乐业。”包拯在此提出减少苛捐杂税及摊派，减少各种夫役、差役，救济灾区难民，并把它作为衡量为政“仁”、“暴”的尺度。包拯这三点，既是着眼于现实，也是总结了历代为政者的经验与教训。仁宗对此非常赞许。

陕西凤翔府斜谷务造河船，每年造船600只，需要的木材要到秦州(甘肃天水)采伐，十分艰难。凡是摊派到采木任务的，都要担当衙前差役，而每轮到一次衙前，每户照例都要赔一二千贯，不少人家为此倾家荡产。包拯将此情况上奏仁宗，请求宽免斜谷务每年造船所需摊派的木材物料、桩橛以及采斫竹竿等任务。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契丹以伐西夏为名,聚集大军于宋辽边境。边关告警。

仁宗命近侍之臣条对御边之策。包拯针对边境局势,提出了守备西北的具体意见。包拯尤其认为河北是边防重地,驻扎有相当数量的官军,但由于连年灾荒,军粮供应不足,应妥为解决。仁宗认为有理,于是命包拯前往河北解决军粮供应问题。

包拯赴任前,建议将河北严重受灾地区的军队调往河东或近南粮食充足地区就粮。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立即调回原驻地。包拯还会同河北四路安抚使并都转运司拟出了军队挪移就食的具体方案。仁宗准奏,下诏说:“徙河北缺粮处士兵及戍兵近南州军,候经置边储有备,复令还屯。”

北宋曾于邢州(今河北邢台)、洛州(今河北永年东旧永年)、赵州(今河北赵县)地区设置广平监牧马,两监共占地15000余顷。后来停废一监,退出一半土地交百姓出租课佃种。这里是漳河淤地,以土地肥沃出名。经几十年的开垦,草地变为良田,佃户年年丰产,向政府交纳粮米10余万石。按群牧司规定,这些土地要退还官府,退耕还牧。佃户不愿迁移,多次向登闻鼓院告状申诉,未得结果。包拯到河北后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得知广平监只有马6000匹,不需要这些田地。一旦退耕还牧,良田沃土又变草地,邢、洛、赵三州人民将无以为生。包拯立即上《请将邢洛州牧马地给与人户依旧耕佃》疏,为民请命,他说:“欲乞且令人户依旧耕佃,供纳租课。伏望圣慈体念河北人户累值灾伤,流亡未复,岂忍更夺其衣食,俾之失所,有伤和气,无益仁化。”包拯随后又上一疏,肯切陈辞。仁宗同意了包拯的意见,这些地方的佃农无不欢欣。